

近代中日法史学界交往的若干片段

——读《书舶庸谭》琐记二题

赵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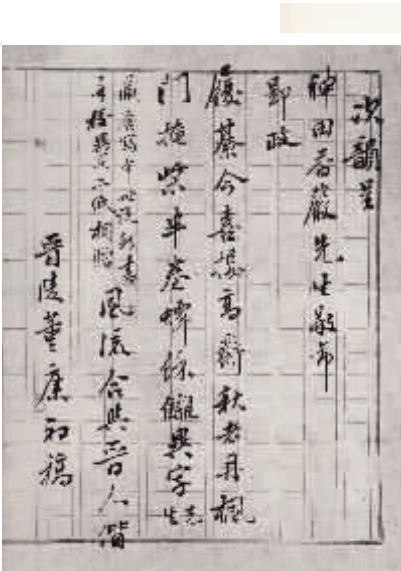
伯希和于 1908 年获得藏经洞文物后,便返回安南河内;复于 1909 年 5 月动身来华,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,并于一个多月后抵达北平。该年 9 月,时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、董康便已侦得此讯,并经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开森,得以接触伯氏,披览并拍摄部分敦煌写本。为集结同好募款集资,委伯氏返回巴黎后将所有敦煌文献制成珂罗版,寄返中国,交由董氏诵芬室印行。董氏力邀罗振玉参与其中,促成罗氏私访伯氏、撰成《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》一文并由诵芬室印制,分发海内。

《书舶庸谭》的作者董康[1869—1948,有关董康生年,通说是1867年。然而据《清代朱卷集成》所收董氏应举文书中载“同治己巳(1869)三月二十二日吉时生”,生年应为1869年。参见孔颖:《晚清中央政府的法制官董康の日本監獄視察について》,《或問》第18號,2010年,第39页。至于他的卒年,一般认为是1947年。然而据北京市档案馆藏“北平市警察局档案”J184-002-04391号档案,1948年5月4日义字64号第二分驻所“呈为地院会同检验董康因病身死由”可知,其卒年为1948年。转引自陈新宇:《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,第33页注1],字授经,号诵芬室主人,江苏武进(今常州)人。进士出身,雅好藏书,专精版本目录之学,以法学、文史之才名重当时。

董氏自清季(1902)受命东渡,考察日本司法刑律以来,此后蹈海赴日凡“廿余次”(董康著,王君南整理: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276页),虽然动因各有不同(如衔命公干、潜逃避难、应邀讲学等),但交游、访书为历次出行所未曾缺者。他由此不仅结交日本汉学重镇如内藤湖南、狩野直喜,法学名流如松冈义正等,还与古籍珂罗版制作“海东第一名手”小林忠等过从甚密,自称“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者”。(《董康东游日

记》,第2页)董氏于1926年12月30日至1927年5月1日避孙传芳通缉之祸,1933年11月8日至1934年1月22日受邀讲学,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应邀出席孔子圣堂落成式,1936年8月19日至9月15日携眷避暑,先后四次赴日,分别见载于董氏《书舶庸谭》卷1—4、卷5—7、卷8、卷9,个中细节颇称详备。至于董氏于1906年4月至12月赴日考察狱政、1911年至1913年因辛亥革命东渡避难等经历,亦有见载于日人日记、回忆录者。(如神田喜一郎的回忆及其所引祖父神田香岩日记,参见氏著《敦煌學五十年》,二玄社,1960年,第157—162页)

因董氏文、法兼擅,文史学界与法学等界致力于勾稽董氏生平业绩者,不乏其例。笔者拟立足于《书舶庸谭》,抽绎董氏与彼时日本学界之交往断片若干,聊作发挥,藉此展现两国学术互动之侧面。唯需说明者,《书舶庸谭》传世者有四卷、九卷之别,前者有1928(戊辰)年董氏自刻本、1930(庚午)年大东书局印本,后者有1939(己卯)年诵芬室重校定本、1940(庚辰)年重印本。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,该书整理本凡三,四卷本有傅杰据戊辰本所作点校(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年),九卷本则先后有王君南以己卯本为底本所校《董康东游日记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1年)、朱慧以庚



↑董康酬神田香岩诗(取自神田喜一郎:《敦煌學五十年》,二玄社,1960)

→《燕塵》第2卷第12号、罗振玉《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》书影(取自神田喜一郎:《敦煌學五十年》,二玄社,1960)

辰本为底本所作整理(中华书局,2013年)。下文即以此三书为主要文献依据,除非必要,行文出注以王君南本为准。

陈寅恪先生曾云:“一时



代之学术,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,以研求问题,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治学之士,得预于此潮流者,谓之预流(借用佛教初果之名)。其未得预者,谓之未入流。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,非彼闭门造车之徒,所能同喻者也。”(陈寅恪: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》,氏著: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三联书店,2001年,第266页)清季以降,中国古文献之重大发现者凡四,敦煌藏经洞文献居其一。学界得预此流,虽有赖外人如伯希和等之力,但董康作为情报搜集、发布者,实在功不可没。

伯希和于1908年获得藏经洞文物后,便返回安南河内;复于1909年5月动身来华,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,并于

一个多月后抵达北平。该年9月,时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(大理寺推丞、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)、董康(时任刑部主事)便已侦得此讯,并经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开森,得以接触伯氏,披览并拍摄部分敦煌写本。为集结同好募款集资,委伯氏返回巴黎后将所有敦煌文献制成珂罗版,寄返中国,交由董氏诵芬室印行。董氏力邀罗振玉参与其中,促成罗氏私访伯氏、撰成《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》一文并由诵芬室印制,分发海内,复于10月4日齐集京内同好公宴伯氏,再商印制法藏敦煌文献之议。[详见王冀青:《清宣统元年(1909)北

(下转12版) ➡

